

在人间 | 写给90岁父亲的家书： 风雨数十载 你一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（上）



第
425
期

写给父亲的家书

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，但是不知从何下手。原准备2020年携全家回国，为父亲庆祝90岁寿辰。一场突如其来的COVID-19疫情，加上父亲因2020年春节期间肺部细菌感染住院，让我一时不知所措。我意识到，自己应该写，而且应该早点写。借父亲节，我将这篇文章，献给那个年代，和那个年代的人。

疫情前最后一次返乡，老家的父母官听说我回来，盛情邀请大家聚一聚，相互认识一下，但被父亲婉言谢绝。

老家的墙壁上，一个简陋的镜框里，放着我和老布什总统的合影。一位访客看到照片，对父亲说，“这张合成的照片做得很好，像真的一样”。父亲一句话也没有反驳。

离家44年，父亲的形象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童年时期，父亲对我是一个迷。因父亲在山区任教，

偶尔才回家；但他在家一言九鼎，很容易发火，而母亲对他总是特别温顺，让我时不时有一种不平和嫉妒感。他对我管教严格，尤其是书写中文，我一直很“怕”他。

在我12岁那年，父亲感染了肺结核，搬回家里生活。疾病久治不愈，让父亲曾极度悲观。那年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躲着流泪。我慢慢感觉到他的可怜，并产生了将来做个医生的愿望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1978年，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，考进云南省重点中学玉溪一中。我对父亲的深入了解，始于入学注册表格中的一栏“家庭政治面貌”。

我在这栏中自己填写了“教师”，被父亲严肃地“纠正”了。那天，父亲沉重地告诉我“在中学时期，我曾经加入了反动的‘三青团’。而

且，由于成绩突出、为人正直热情，被同学选为队长。”这个档案，一直跟着我，直到出国。

许多年后，我慢慢知道，父亲这个“反动历史”的全称是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，“三民主义”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、民权、民生。

1980年，16岁的我，以全省名列前茅的高考成绩，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，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医生梦。临行前的几个月，父母亲断断续续地向我“交代”了他们和家族的历史。

父亲中学毕业后，受抗战的影响，参加了滇军。1949年末，云南和平解放，滇军接受了解放军接管。因为有文化，他十几岁就在解放军部队升为事务长。返乡后成为一名教师。但因为“历史问题”，他被分配到山区任教。

而我的母亲，家里曾经有商店，有土地。但外公生性胆小，1950年把土地、商店和自家住房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，那时叫“公私合营”。据母亲回忆，外公站在领奖台上，胸口戴着一朵大红花，全身却在颤抖……从此，外公外婆一大家人，靠租房过日子，直到去逝。外婆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“我的房

子……”。因母亲“政治清白”，留在县城凤山小学任教。

有趣的是，在小县城教师队伍中众多追求者中，母亲挑选了父亲。据说，当时的父亲为人热情正直、性格刚强、才华横溢，深受同学和老师们的爱戴。

因为母亲选择了一个有“问题”的年轻人，尽管她年年被同行评为“劳模”，却失去了许多晋升的机会。尽管如此，母亲无怨无悔，也从来不委屈自己的感情和自尊。

“消失”的祖辈

幼年时期，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淡漠的，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1966年，我两岁时，他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关押在孔子庙里。母亲除了给他送饭，在孩子们面前从未讨论过他。我自己的奶奶在文革早期才60几岁就抑郁而逝。几年后，爷爷也走了。

后来，父亲被送到老家接受“改造”，和他在一起的，都是“地富反坏右分子”。有一天，一位老爷爷在农田里给他打招呼，我问“他是谁？”。父亲第一次告诉我“他是你老老弟”。之后我发现，这位“老老弟”每次批斗会都站在台上，

戴着一顶又高又尖的帽子，上面写着“地主军阀张XX”。他低着头，弯着背，尽量不要让别人认出他。除了那次偶遇和每次的批斗大会，这位“老老爹”在我的生活中就这么又消失了。

因为父母是教师，我的童年，一直都住在学校里。在一段时间里，校园的操场上，每周都有批斗会。民兵们拿着一把老式三八步枪，不停地把“反革命分子押上台”。而作为老师，母亲和同事们则需要反复地为批斗会书写大幅“革命”口号和标语。

而我自己，在学校的要求下，小学作文里，写得最多的就是“旗帜鲜明”地反对“孔老二”的“克己复礼”。那些离去或“消失”的祖辈，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。

1976年，“甜蜜的十月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”。那个“消失”的“老老爹”，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。

几年不见，他变得精神焕发，走路如风。一根拐杖拄得很有风度。他虽然是个“农民”，但当他为我写了几个字时，我的下巴掉了下来。后来，他的字体，成为了我和其他学生的模版。